厘清事物演变的脉络，从最原始的文献出发。

一般情况下，越靠后的东西，越附会越复杂，也就越让人找不着北。

凡是类似的政治体制里，能在最高权力场上立得住的，都不会是什么善茬儿。

卦占卜的解释权完全掌握在专业占卜师的手里，算出来的卦其他人是看不懂的，到底老天爷是怎么指示的，全看占卜师怎么说。

领导嘛，出了事哪能不往外推责任呢？要么就是杀几个替罪羊，要么就是归咎于自然灾害，要么就是把主要责任推给上一届领导人。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全句联系起来，意思就应该是：乾卦的意象是天，天的特征是运动不息，君子要效法天，也要达到运动不息的程度，而达到这一程度的途径就是自强。

历史似乎总是这样的：是权力选择思想，而非思想获取权力。正如几乎任何一种信仰，无论是无神论的还是有神论的，无论是一神论的还是多神论的，一旦走人大众，都只会变做同一个样子：仪式化的偶像崇拜和一厢情愿的消灾祈福（而他们所祈求的往往是为教义所禁止的）；几乎任何一种思想，无论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无论是德治的还是法治的，一旦专制权力，也只会变作同一个样子。

正所谓“实现正义的热情，会使我们忘记慈悲为怀；对公正的热望；使许多人成了铁石心肠。”——奥克肖特《巴别塔》

越是暴君越是喜欢推行美德。

混鱼龙人海，快一夕，起鲲鹏。

驾万里长风，高掀北海，直入南溟。

生平许身报国，等人间、生死一毫轻。

落日旌万里，秋风鼓角连营。

炎方灰冷已如冰，余烬淡孤星。

爱铜柱新功，玉关奇节，特请高缨。

胸中凛然冰雪，任蛮烟瘴雾不须惊。

整顿乾坤事了，归来虎拜龙庭。

《新唐书》比《旧唐书》更加符合“春秋大义”，修史的目的不是为了客观如实地记载历史，而是要着重体现出褒贬色彩，有劝勉、有惩诫，以期“再使风俗淳”。

社会利用家族对每个人的影响力，作为保持人们自建和平的手段。

《穀梁传》：“君不尸小事，臣不专大名，善则称君，过则称己”。

在儒家的眼里，真正的高手是靠搞政治来玩转天下，而绝对不是靠武力，所以推崇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而不是“一将功成万骨枯”。

通经致用，学习经典是为了让圣人的思想知道史记的政治工作。

当经典被官方确定为唯一的意识形态，对丝毫的偏离都视为大逆不道，于是异见分子能使自己的想法和行动合法化的惟一办法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了。从这层意义上说，越是长篇大论的经典也就越是容易被人找到下手的地方。

无论想干什么都可以从经典中找到根据。

一种神圣的意识形态里绝对存在着不止一部经典。

儒学的核心是在政治，儒家的政治思想核心并不是主要体现在《论语》当中，而是体现在《春秋》里的。

每一部经典都是要经受千锤百炼的，西方的《圣经》在一千多年来无数神学家的手里已经被打磨得几乎天衣无缝了。

经书的内容和古人的思想、行为是水乳交融的。

宗法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又是以家族宗法为核心扩展成为国家政治统治。

就这么在国外自杀，也许是一个最为“政治正确”的结局，这样的结局也许对各方面的人马都有好处，只除了那些无辜的、也不可能再跳出来为自己喊冤的死者。

越是卑鄙的动机，就越是需要正义的口号。

如果事情尚有可为，则为之；如果事情已不可为，那就只好“既往不咎”了。

“自由”本身就是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它的弊病多如牛毛·可不知怎么依然有那么多人追求自由，托克维尔便解释说：“人们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人们并不是在追求“自由”的哩想，而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已；

墨索里尼拥有众多的支持者，现在看来简直不可理喻，可伯林评论说：“人们之所以拥护墨索里尼，是因为他们害怕无政府状态。"

懂得了对大众既要许之以利，又要动之以情，但绝对不可诉诸理智。

说理与论证战胜不了一些词语和套话。

分析一个独立的个人和分析处于群体背景下的这同一个人需要分别讨论。

权威的影响和群众的影响是如何使一个当之无愧的理性人丧失了他原本的理性的。（米尔格莱姆的实验）

一种思想，乃至一句话，常常可以有无限多的解释，到底是什么意思，不是看它声称自己“是什么”，而是看它声称自己“不是什么”。

对于高官被处极刑，老百姓一般看到的事情总是这样的：又一个大贪官被查处了，好啊，大快人心啊，皇帝圣明，清官努力。

但真实情况往往是：很少有官员真正是因为贪污腐败而下马的，不贪不媚的人是很容易被官场的竞争法则所淘汰的。

下马的所谓贪官往往只是权力斗争的失败者、牺牲者，把他们整下来的人未必就比他们清廉。

大多数的政治斗争基本上都只是围绕着同一个问题：站队、上位、拿钱。是生是死全在长官的一句话，全看你跟长官的关系如何。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人如果不虚伪便无法自保。

越是天下一统、思想一统的时代，人们就越是习惯“真理只有一个”，也越是想当然地认定这个真理掌握在权力者的手中，也扎根在自己的心中。于是，当“另一种声音”出现的时候，甚至在权力者还没有下手剿灭之前，人民群众便已经怒不可遏了。

当“真理只有一个”，并且这真理掌握在我们手中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异见便只会成为“诽谤”，而审判、乃至杀戮一个“诽滂者”，难道不是正义的吗？

当某个时代告一段落之后，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其全貌才能被重绘。关于这个时代的情况，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只有经过足够的忍耐与沉默，才有机会被大幅再现，被更为客观地评价，并且让人们深刻反省，从而吸取历史的教训。

永恒的艺术通常产生在灾难最深重的年代。

任何人的死亡都是对我的缩小，因为我是处于人类之中。

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在专制的土壤里是生存不下去的。

奴性已经养成了，扎根到骨子里了，对那些没有奴性的人看不顺眼了。在哈巴狗的眼里，狼是粗俗可鄙的。

既然诽谤罪如此严重，自然应该谨慎处理，这个谨慎也许就意味着“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需求决定供给。对于经典来说，时代呼唤什么，它就应运而生什么。无论什么学派，只要是被指定为官学，模样就会变得差不多。

专制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人和人之间越发的彼此相似，学说和学说之间也越来越像是同门。

乌鸢之卵不毁，而后凤凰集；诽谤之罪不诛，而后良言进。故古人有言：“山薮藏疾，川泽纳污，瑾瑜匿恶，国君含诟。"

歌功颂德的声音满天飞，不知道底细的还以为秦朝是个太平盛世呢，哪知道火山口就在鲜花底下蠢蠢欲动，这就是秦帝国迅速败亡的原因。

只有在宽松的言论环境下，真知灼见才有露面的机会。

言论有自由，意见有导向，朝廷有政策，头顶有钢刀。

之所以需要设定禁忌，是因为有些见不得人的东西害怕曝光。

因为专制时代言论不自由，人民发明了一种隐喻法，于字里行间表现意思，称为”奴隶的言语“。（周作人）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北岛）

国王被安置在自己特有的一个圈子里，被一种气氛包围着，不可能看到事物的真相。接近他的那些人最关心的事情，就是不让他了解真实情况，这些人结成了阴谋集团。

经常数落国君的就是忠臣。

老百姓养蛀虫，不怕蛀虫馋嘴，就怕蛀虫生事。

统治者对自己的政治能力越是有信心，对逆耳的声音也就越是宽容。

表彰是一回事，付诸实践是另外一回事，两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只有当具体的改革方案落实才会真正触及到既得利益集团，从而引起强烈的反扑，但泛泛的改革方案却是最好的帕累托改进。

在中国，人们总是把不合时宜的政策与道德败坏等同起来。（费正清）

“求实”是学者的责任，是政客的烦恼，是大众的逆鳞。

一直心猿意马的人，活得就很纠结；一直在为某事做准备的人，活得就很有幸福感。准备本身就是幸福感的来源。

财富，要高幅度，小频次；幸福，要小幅度，高频次。

带着使命感，一直为了某个伟大的时刻做准备，在任何环境下都能成为一个独特的人。

人的普遍认识是：第一，真理只有一个；第二，真理在我手中；第三，和我的真理相抵触的说法都是歪理邪说；第四，既然是歪理邪说，就得严厉打击，以免危害社会。

《老子》五千言，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所以，这个问题是无法言说的。如果你始终不说，你还可能理解对了，但你只要一说出口，那就肯定错了。

我们看到历史上有不少昏乱的世道，那并不是因为国道不见了，而是因为昏君们不好好开车，拐到歪门邪道里去了。

歌功颂德全要靠音乐。

琴走音了，得把琴弦松下来，重新调整一下。政治搞不下去了，也应该换个思路，另外搞搞。

格劳孔说：那些做正义之事的人并不是真正地出于正义而为之，而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作恶的本领。

既得利益者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无论他们已经腐朽到了何种程度。

虽然官方经常宣传什么直言进谏、心口如一。可现实一再告诉人们：有话直说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即便现在不收拾你，早晚有一天也会秋后算账。

天降祥瑞的皇帝当然就是真命天子了，其合法性是勿庸置疑的，道德品质之高更是勿庸置疑的，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不仅是我们全国人民的政治领袖，同时还是我们全国人民的伟大导师和道德楷模。

既然皇帝是君权神授，那老百姓自然该以服从为天职。就算君权是历史、阶级、民族所授予，老百姓还不是无条件服从？

也许神还是更可靠一些，毕竟神是无所不知，而且可以惩恶扬善，撤换掉不喜欢的代理人。改朝换代就是理所当然的了，真到了那个时候，投靠新主子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无非是顺应天意嘛。

时代变了，传统儒家的思想行不通了，该是无条件忠君报国了，该对着龙椅宣誓效忠了。

相对于自由，很多人却宁愿选择服从；相对于直立行走，很多人却宁愿选择屈膝爬行。这恐怕既是人的天性所致，也是专制之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吧？

生在这朝，皇恩浩荡，臣子应当肝脑涂地。

《朱批谕旨。田文镜奏折》（雍正）七年六月十五日：“但尽臣节所当为，何论君恩之厚薄。”【转引自秦晖：《传统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佣5年第1版，第17g页）】

如果做臣子的整天都说先王如何如何好，这不也是等于在骂自己的主子么，这样的臣子也绝对不是忠臣。

怎样才是忠臣呢？很简单，别提尧舜汤武那些古代圣王如何如何的好，别提先烈们如何如何的崇高，只要尽力守法，忠心不二地服侍主子，这才叫做忠臣。

董仲舒就是以“君权神授”在传统儒家思想和法家的无条件忠君思想之间巧妙地搭了一座桥梁。

中国最深厚的传统思想是明君专制。

西方神授之权不是国君独有的，而是国君和老百姓同样拥有的。正因为有王权和教权的制衡，这种颠覆性思想才得以存在下去。

立了靶子就是为了动手去打的。

权威是上帝给的，所以无论君主有多么不称职，臣民们都应该服从。

洗礼可以使人产生对未来的希望，但这并不会免除我们的额原罪，我们照样会死，照样会经受许多不幸。

暴君政治是君主政治腐化变质的政体。

氏族时代，父家长是家庭的绝对统治者，他握有生杀大权，对待子女等家庭成员像对待奴隶一样，不受任何限制。

儒家统一天下，只是个幌子。通常是政治改造思想，而不是思想改造政治。

儒家一直都在演变，如果还是常常搬出孔子、孟子来论证，那就是范刻舟求剑的错误了。

提供资格证明，不就是刻章办证么，只要有这种需求，市场马上就会跟进以有力的供给。

有权利打假的人同时也正是假货的需求者。在专制体制下注定不会被认真对待的，而越是高明的家伙贩子，就越是有升官发财的机会。

大小官员本来就忙着造假、忙着腐败、忙着打击异己，做正经工作的时间已经被挤得剩下不多了，再被安排学习典型，更是挤掉一大块。

当然不会把那些典型当真，只会把学典型学得勤勤恳恳。当然，老百姓还真把典型当真了。

在思想上，当造假事件涌现的时候，不一定以卵击石前去声讨，但至少不参与造假，不去助纣为虐、为虎作伥。

造假使坏、溜须拍马的勾当如逆水行舟。

当歌功颂德成为每个人必修的功课时，仅仅是歌功颂德不够肉麻，都会将自己从人群中凸显出来，任身家性命作聪明人邀功请赏的战利品。

专门有一部分国家机器严查着所有歌颂的声音，消灭歌颂外的音符就成了某些人理所应当的本职工作，靠扼紧别人的咽喉来领薪水。

一个好人和一个坏人同样容易犯错。

少数人垄断出版自由（至少表面）是为了不听错误的消息，或者不让大家听错误的消息。

王夫之：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正经话不必正经来听，不正经的事却必须正经去做。

法家要塑造的是强权皇帝，但这事最好关起门说；儒家要塑造的是圣人皇帝，这事可最好敞开了满世界去说。

看着这些圣明的君主们剪除敌人，把权力大揽在手，后坚决肃贪，贪官们看见他们就浑身发抖，他们还如此亲民，笑呵呵地走访穷困的乡亲，他们还如此俭朴，一件衣服打了补丁穿很多年“““是呀，这是老百姓们最最喜闻乐见的了，这真要感谢一些天才们超卓的造梦本领，也见得老百姓心里永恒的期望。

虽然各怀鬼胎，但受制于彼此间的约束而干不了多少坏事。

康德有关民主体制意见

因为：（1）人的私欲永不可免；

（2）道德完人永不可求；

（3）绝对理性绝对没有，

所以：（1）“以德治国”绝无可能；

（2）当以民主宪政使人们彼此互为制衡时，在这个制度之下，就算是魔鬼，也只能空有无限坏心却做不了多少坏事了。

其涵义是：人民群众的普遍素质哪怕再低，也不会妨碍到民主制度的运作，进而也不会妨碍社会总体福利水平的提升。

圣人即便当真是可疑的，但他毕竟是迎合广大人民群众和只是分子的呼唤的。

统治者需要把自己打扮成圣主，于是便有了圣主，于是便也出现了不少上赶着把自己的主子打扮成圣主的聪明的奴才。

儒家的“礼仪”正是造假的最绝妙的技术，它以森严的等级秩序（外在的和内在的）把统治者高高地架在空中。

是的，这个统治者也许是个不折不扣的坏蛋，但当他端坐在高耸人云的金銮殿，穿着和别人迥然不同的华贵衣着的时候，“仪式化”给他带来的万丈光芒往往使仰望的百姓们崇敬不已。

嗯，当我们在午夜的长街仰望一支巨大的霓虹灯时，我们是看不到灯管上的灰尘和鸟粪的——这就是“礼仪”的一个重要意义。

社会上总得有点儿穷苦人家才好，如果没有他们，政客们上哪儿去展示满腔高贵的同情心呢？

形式主义确实有安定人心的作用。正如贝格尔所说：最初的一切秩序化都具有神圣的特征。

这很有讽刺意味，人们总是嘴上希望统治者平易近人，可心底却深深膜拜着那些高高在上的家伙。

开国大典：江山不是从前朝那里继承下来的，而是从老天爷手里接过来的，老百姓都要明白这一点才行。

亲贤臣，远小人之不可行是由于：人是趋利避害的；没有人是一成不变的；权力是最好的腐蚀剂。

在权力的场上，作贪官乃是保全自己的一种有效手段。有办事能力而且适度的贪，更容易让领导放心，认为你的野心不过如此。

专制体制下的反腐，往往只是权力博弈的手段和副产品。

岳飞的回答“文官不爱财，武将不惜命”的标准是不可能在实际中产生作用的。如果这样，那奖励对官员们没有激励作用，惩罚对他们也没有震慑作用，根本没办法使唤。

《老残游记》：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眼所见，不知凡己矣。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信任是专制之母。

在这样一种高尚的游戏规则之下，之恩那个是口号日渐响亮，人渣步步高升。

一个拿小钱不当回事的人，很可能在流着口水，盯着大钱。一个人如果没有常人共有的那些欲望，他很可能所图甚大。

贪财不要紧，领导有钱赚，要让大家一起有钱赚；怕死不要紧，领导保平安，要让大家一起保平安。

儒家知识分子口口声声的“亲贤臣，远小人”的劝导虽然在两千年来回音不绝，让我们几乎信以为真，但是，它始终只代表了一些善良人们的善良愿望和一些聪明皇帝的表面文章。

“国家民族”这些高尚的字眼是用来作为优美的口号鼓舞着士气人心的。

靠恩赐得来的幸福是不可以安心地揣在怀里的。

只有做到“国强民弱”了，朝廷才可以轻易压得住人民，可以充分用赏罚来操作众人。人民越是愚、越是弱，朝廷操纵起他们来也就越是顺手。

一波才动万波随。

无论那一类领袖，都会利用无政府状态来增强自身的权力，并借此削弱他的竞争者。

领袖将自己的奋斗说成为百姓奋斗，并要求百姓做出必要的牺牲：放弃对权力的控制，放弃自由所带来的满足。而这样做的目的是帮助领袖及其最随着。

历史中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是老一辈的一生。

语录体的东西就是经常不给出上下文，只是孤零零的一句话，让人去猜。

流风绵延到秦、汉以后，直到晚清、民国，皇帝要祭天、祭地、祭祖，也要这样作作自我批评“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这句话成为了皇帝们的经典台词。当然，皇帝如果这么说，大家听了自然也会舒舒心，可皇帝心里是否真这么想，这却要打个大大的问号了。

灾害不过是饿死了一批草民罢了，只要加强管制、加强宣传，连哄带打，不要让他们闹事就行了。

最古老的风尚：一个国王，往往同时还是一位“祭师”，且要替天下担负了一起罪过和不洁。这个不成文的法律到如今才清灭了不久。

龙舟竞渡是为了穰灾，配合龙舟竞渡的还有一大堆巫术活动。

部落里的人因为生活资料匮乏而不得不杀死婴儿，这到底是个残忍的做法，于是他们发明出来一些折衷的办法，比如规定出吉利的日子和不吉利的日子，在吉日出生的孩子就让他活下去，在不吉利的日子出生的孩子就被杀掉或者被抛弃在森林里。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阴阳五行学说，在当时并非全新的东西，并非突然间横空出世，而是早有了至少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铺垫，只有如此，董氏理论才能够水到渠成。这正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在我们的传统当中，总是把发明权归到少数名人的身上。

有些问题，如果你不去理它，什么事也不会发生，可你一旦捉摸上它，越是捉摸，结论就越是骇人，日蚀正好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现代有人说“天人感应”之说虽然迷信的很，却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制约君权的作用。

只要专制体制不变，那么，凡是领导讲话、官样文章，就都是那些个模子，千百年来没什么太大的改变。

正史里那么多灾异，皇帝们那么多自我批评，到底有多少是因为怕了老天爷，又有多少仅仅是权谋的手段，或是走走过场的形式主义呢。

事实有两种，一种是真实的事实，一种是正确的事实。真实的事实往往是很难辨认的，正确的事实却总是一目了然。

老百姓抬头仰望，以为是一群冠冕堂皇的圣人在为冠冕堂皇的神圣路线据理力争，其实只不过是一些阴谋家和势利小人在口蜜腹剑、钩心斗角。

旧谎话的破绽需要新谎话来圆，补丁越补越多，理论就越来月复杂。

一个名词/名目/概念，在不同的时代里，字面也许是一成不变的，但实际的内涵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动着，甚至是剧烈地变动着。

世界卫生组织将慢性疼痛、失眠和抑郁列为最降低生活质量的三个要素。

一件事的真假往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是否把它当真。

放下历史的包袱，轻装整队朝前看。

改元之类的手段的另一层意义是：新瓶装旧酒，给大家一些万象更新的美好联想。

成统治者的艺术，就像律师的艺术一样，首先在于龚驭词藻的学问。这门艺术遇到的最大困难之一，就是在同一个社会，同一个词对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往往有不同的含义，表面上看他们用词相同，其实他们说着不同的语言。

人民群众的眼睛很少会是雪亮的，当然，使人民群众相信他们自己有着雪亮的眼睛，这对统治者是大有好处的，人民群众往往会在这种盲目的自信里用他们“雪亮的”眼睛追随着聪明的统治者手指的方向，哪怕那个方向正通向悬崖峭壁。

勒庞说：“词语只有变动不定的暂时含义，它随着时代和民族的不同而不同”。

我很愿意为君王效力，但结果得是双贏，君王得好处，我也得好处，至少也要君王得好处而我没坏处。可要让我英雄流血又流泪，这我可不干！

古之君子，绝交不出恶声；忠臣去国，不洁其名。

世上没有不是的父母，也没有不是的皇帝，皇帝办的错事那都是因为受了奸臣的蒙蔽，罪在奸臣而不在皇帝。乐毅虽然以忠臣自命，但显然不是一个忠臣。

春秋时候的忠，无非是敬业尽责罢了。

“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的关系才合乎人之常情，毕竟没有几个人是天生的贱骨头，任凭别人怎么打骂、侮辱，还能始终不二地效忠到底，甚至在这种受虐的过程中还能品味出自我牺牲的伟大快感。

或许，所谓“本身固有的文化根基”，刨除宗教信仰之外，无非是一种生活习惯，在这层意义上的“爱国”也许只是坚持一种生活惯性而已。

一个美好字眼所定义的东西并不一定就像这个字眼本身一样美好。

要想控制住人民，就得轻视有实用价值的东西，而重视没有实用价值的东西，所以，应该轻视粮食而重视珠宝，轻视生产而重视礼乐。

如果只有破衣烂衫和粗茶淡饭，谁还会卖命呢。

富人越是高消费，穷人就越是有事做。穷人就是这样靠着富人的奢侈而谋求到自家的生计，不必依靠政府的赈济。

争取民心并不是为了给大众谋福利，而是为了使国民能更顺手为我所用。

法律定要合乎民意才可以公布出来。法律是社会习俗的产物，而不是某个“圣人”凭着异乎常人的理性而凭空创造出来的，也不是某个专制统治者为了一己之私利而强加于全体国民的。

不应该独断专行、事必躬亲，而要做到少做事，多任法，因为法制完备了，一切人与事都会各安其份，在法制的框架内靠惯性运转。

有需求的永远都是人，而不是社会。

道德习俗可以使任何行为都成为正当的。

我们以为良心来自天性，其实它诞生于我们的习俗。

某一世纪的欲望就是后来世纪的道德基础。强烈的欲望作为狂热和激情的产物，当它被使一切物质和精神现象归于平衡的时间所冷却和消失蚀后，逐渐变成了后来的保守，变成了当权者和投机者手中的工具。

面包和清水维系着个体的生命，迷信则维系着作为整体的社会群体。

对意义和秩序的追求是人类的本能。

在大部分问题上接受现成的意见是最省力的。在任何社会里，思想的自由可能只对很少的人才有直接的意义。

人一旦有钱了，也就不好使唤了。人只有既不是太富，又不是太穷，使唤起来才顺手。

民心的向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统治者必须要有足够的手段来凝聚民心。

贤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诎贤者也。

社会高度分化，个人能够从他人的知识中受益。

当老百姓对不公正已经习以为常的时候，重典与否对他们又有多大的影响呢，反正都是权力者在黑箱里玩玩技术罢了。

成功认识的成功历程无论再怎么偶然，也总能被人们解读出无限的人生哲理。

历史事件本身的逻辑性，远不如史书上的记载。当后人去精心分析时，所获得的感悟就会更有质地。

书写历史就是这样，任你千变万化，我总能说出道理来。

古人造假比现代人有良心多了，虽然假冒，却绝不伪劣。

打胜仗不难，难在保持胜利成果。越是胜利越是谨慎，这才是有道君主的作风。

社会不平等导致了古老的田园牧歌式的社会无法重现，导致了黄帝、尧舜禹时代成为海市蜃楼。

如果只能 二选一，那么被人畏惧比受人爱戴要安全得多。

人们爱戴君主，是基于他们自己的意志，而感到畏惧则是基于君主的意志，因此一位明智的君主应当立足在自己的意志之上，而不是立足在他人的意志之上。

最坏的家伙，最容易爬到权力的顶峰，最恶毒的主意也同样最容易得到广泛的实施。

劳民伤财，有助于社会稳定。

管理要善于用别人的脑子，用贤人的脑子最好。

暴君往往是极有领袖魅力的家伙，就像撒旦一样，英俊潇洒，雄辩滔滔。

自欺欺人的骗术（宗教）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受骗者期待着受骗。骗子会在狂热的期待气氛中首先迷失了自己，使自己成为了自己的第一个受害者，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和骗子一起互动，很快把骗局推上了高潮。

仪式越复杂，庄严程度越高。

也许正因为对仪式的迟钝，长大以后还一直对人群抱有疏离之感。

散布真假参半的消息，或在传播过程中被一次次地以讹传讹，但听众们却有可能从种种不同的声音渠道中对各类矛盾的信息做出自己的判断和辨别。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意义和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并没有什么两样，只是手段更加高明罢了。都是以一种惟一正确的声音压制所有其他的声音，而事实上，这种声音之所以是惟一正确的，仅仅因为它是官方的。

历史上的一般情况是：只要现在生活的地方不是人间地狱的话，绝大多数的人都会选择维持现状的。

变化意味着行动，而行动的后果往往是不可预知的，所以选择行动也就意味着可能会后悔和自责。人们为了避免承担责任，通常都会选择维持现状。

“用鬼神使他们敬畏天命，用繁文缛礼使他们丧失自然天性”，复杂的等级仪式把皇帝推到了近乎于神的位置上，让全国人民顶礼膜拜。

聚拢追随者，这才是统治者害怕的。所有的人心都应该只归向同一个人，那就是最高统治者。

将相和的局面，一直都是君王们大为忌讳的。不论他们有没有争权之心，反正是触了统治者的忌讳。

专科举考试看起来给读书人提供了跳龙门的机会的政治举措，或许也是皇帝们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定、为了造成一盘散沙之局面的刻意设计。

稳定远比其他的任何东西都重要。

国家权力与其说是通过法律，不如说是通过社会舆论发挥作用。

一个出色的政客，总是要善于制造敌人，也善于制造紧张气氛。

一代代的经学家与政治家们不断在以事实与虚构交织的历史来影响时下的政治，他们对经籍的探微求玄往往求之越深则失之越远。在“唯一正确”的意识形态指引之下去研究这种意识形态本身，这一工作在中国历史上持续了两千年之久。于是，一片片的玉石与金线在无数人的精心打磨与织造之下成就出一袭精美绝伦的金缕玉衣，夸张地包裹起了圣人的尸体，那是一具存在于所有人信念中的圣人的尸体。